



# 中国古代人格心理学思想

杨春晓

人格心理学（Personality Psychology），亦称个性心理学，是以研究人的能力、气质和性格为主要内容的一门心理学基本分支学科。在这方面，中国古代亦有着丰富的思想。综合古代的人格心理学思想，主要有三大方面：即人格形成思想、人格分类思想、人格鉴定思想。兹分析如下。

## 一、人格形成思想

中国古代关于人格形成的思想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即染积说、差异说、阶段说。

### （1）染积说

这一观点的意思是说，人格是在各种因素的“熏渍陶染”、“潜移默化”的作用下逐渐积累而形成的。“染”和“积”最初是两个概念。最早提出“染”的概念的是墨子。他说：“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sup>[1]</sup>这里的“染”即指由外向内渗透。后来，荀子又提出一个与之内涵一样的概念“渐”，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所渐者然也。”<sup>[2]</sup>这里的“渐”也是由外向内靠近、渗透之意，与“染”同。故此，东汉的王充将两



个概念合用，称“渐染”。王充说：“十五之子其犹丝也，其有所渐化为善恶，犹兰丹之染练丝，使之为青赤也。……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善渐于恶，恶化于善，成为性行。”<sup>[3]</sup>古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是指“渐染”的作用。

但是外界因素的“渐染”作用，只是人格形成过程的一个方面的作用。“渐染”要发挥好的效果，还离不开被“渐染”者的能动作用。正所谓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里，内因的能动作用体现为“接受和积累”。对此，荀子用一个概念“积”来表述。其意是说，人只有不断接受，长期积累外界信息，才能逐渐形成自己的人格。荀子说：“真积力久则入”“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sup>[2]</sup>又说：“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sup>[2]</sup>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把古代思想家关于人格形成的过程称作“染积”说。

究竟哪些外在因素对人格的形成发生“渐染”作用呢？对此，古人亦有清晰的认识。古人认为，家庭、师友、邻里、社区、民族、教育（教学）、圣人之言等都对人格的形成发挥“渐染”作用。所以古人特别重视“慎交友”、“慎居处”、“慎择师”等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人格受到积极因素的“渐染”作用。

## （2）阶段说



古人不仅认识到人格的循序渐进、不断积累的形成过程，而且还认识到人格的形成过程具有阶段性。也就是说，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便发生质的飞跃。孔子就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sup>[4]</sup>《淮南子》也写道：“凡人之性，少则猖狂，壮则是强暴，老则好利。一人之身既数变矣。”<sup>[5]</sup>这一点，与西方现代心理学的人格发展理论有其一致性。

### （3）差异说

孔子所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荀子所言“生而同声，长而异俗”等，都道出了人格发展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性质的差异。不仅如此，古代思想家还认识到由于发展速度的快慢而造成的早晚差异。如三国魏时的刘劭就说：“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有少无智而终无所成者，有少有令材遂为隼器者。……早智者浅惠而见速，晚成者奇识而舒迟，终暗者并困于不足，遂务者周达而有余。”<sup>[6]</sup>毫无疑问，刘劭的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

总的来看，古代思想家关于人格形成过程的“染积说”、“阶段说”、“差异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格形成的规律。

## 二、人格分类思想



古代思想家为了增进对人的认识，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人格进行分类。如孔子、荀子、刘劭等人以及《黄帝内经》等著作，都在这方面有深入研究。兹分述如下。

### （1）孔子的人格类型说

孔子从德行、智能和气禀三个方面对人格进行分类，提出自己的人格类型说。

首先，孔子从德行方面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这一划分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全部历史，直至今日，仍深入人心。孔子对君子与小人的界说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以上引文见<sup>[4]</sup>）此后，《荀子》《淮南子》等著作对孔子的界说作了进一步的发扬。

其次，孔子从人的气禀方面将人分为狂、狷和中行三种。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sup>[4]</sup>“狂”即敢说敢为，积极进取；“狷”即遇事拘谨，不敢作为；“中行”则是言行合乎中庸。



---

再次，孔子从智能的角度将人划分为上智、下愚和中人。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sup>[4]</sup>“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sup>[4]</sup>

## （2）荀子的人格类型说

荀子除了继承孔子的君子、小人观之外，又提出了新的人格类型说。

首先，他根据“勇”的程度，把人分为上勇之人、中勇之人和下勇之人，荀子说：“天下有中（正道之意），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共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上勇也。礼恭而意俭，大齐信焉，而轻货财；贤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废之：是中勇也。轻身而重货，恬祸而广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胜人为意：是下勇也。”<sup>[2]</sup>这里的上勇是大智大勇，中勇次之，下勇是匹夫之勇，逞一时之快。

其次，荀子根据“勇”的性质，将人分为狗彘之勇者，贾盗之勇者，小人之勇者，士君子之勇者。荀子说：“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然唯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例，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sup>[2]</sup>这一



划分，实质上是在小人之勇与君子之勇的基础上，将小人之勇分化为三种，并与士君子之勇相对。

再次，荀子根据德行，将人分为通士、公士、直士、慤（què，诚实之意）士、小人五种。荀子说：“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若是则可谓通士矣。不下比以暗上，不上同以疾下，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身之所长，上虽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虽不知，不以取赏；长短不饰，以情自竭：若是则可谓直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若是则可谓慤士矣。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sup>[2]</sup>这实质上是在君子与小人的划分基础上，将君子分成四种，并与小人相对。这样进一步分化而具体，更增进了此依据的准确性。

### （3）《黄帝内经》的人格类型说

《黄帝内经》对人的划分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从秉持阴阳之气的多少，把人分为太阴之人，少阴之人，阴阳和平之人，少阳之人，太阳之人。二是从五行的角度，将人分为金形之人，木形之人，水形之人，火形之人，土形之人。前者侧重于心理，后者侧重于生理。两类相互搭配，又形成二十五种复合型之人。就阴阳五种人格的本性、德行而言，《黄帝内经·灵枢》写道：“太阴之人，贪而不仁，下齐湛湛，好内而恶出，心和而不发，不务于时，动而后之，此太阴之人也。少阴之人，小贪而贼心，见人有亡，常若有得，好伤好害；见人有容，乃反愠怒，心疾而无恩，此少阴之人也。太阳之人，居处于于



（得意自足的样子），好言大事，无能而虚说，志发于四野，举措不顾是非，为事如常自用，事虽败而常无悔，此太阳之人也。少阳之人，是谛（shīdī，做事精细审慎）好自贵，有小小官则高自宜，好为外交而不内附，此少阳之人也。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谭而不治，是谓至治。”<sup>[7]</sup>此外，《黄帝内经》还从情态、年龄、体型、勇怯等方面揭示人格的特征，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4）刘劭的人格类型说

刘劭，三国时魏国人。所著《人物志》是一部享誉世界的心理学著作。在这部著作里，他对人的材能、性格、智勇以及鉴定方法等作了系统的研究。

首先，刘劭从材能的角度对人进行分类。从总体上说，他把人分为兼德、兼材和偏材。在此基础上，提出十二材，即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藏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之材，并对各材的特点和宜任官职作了界说。

其次，刘劭根据阴阳五行生成说，类推出人的五种性格：即木—弘毅、金—勇敢、火—处理、土—贞固、水—通微。然后在此基础上把人的性格分为十二种类型，并对每一种性格的总体特征及其优缺点予以精僻界说。根据原文内容，兹列表如下（参见《体别第二》）。

---

方差来源	性格总的特征	性格的优缺点
------	--------	--------

---





强毅之人	狠刚不和	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许
柔顺之人	缓心宽断	柔顺安恕，每在宽容，失在少决
雄悍之人	气奋勇决	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多忌
惧慎之人	畏患多忌	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
凌楷之人	秉意劲特	强楷坚劲，用在桢干，失在专固
辨博之人	论理贍给	论辨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
弘普之人	意爱周洽	普博周给，弘在覆裕，失在溷浊
狷介之人	砭清激浊	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局
休动之人	志慕超越	休动磊落，业在攀跻，失在疏越
沉静之人	道思回复	沉静机密，精在玄微，失在迟缓
朴露之人	申疑实[石舀]	朴露劲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
韬讷之人	原度取容	多智韬情，权在讷略，失在依违

再次，刘劭还从智勇关系，将人分为英才型、雄才型和英雄兼备型。《人物志》写道：“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聪谋始，以其明见机，待雄之胆行之。雄以其力服众，以其勇排难，待英之智成之。然后乃能各济其所长也。”“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zhǎng)世。高祖、





项羽是也。……徒英而不雄，则雄材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则智者不归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sup>[6]</sup>刘劭的这一界说是从人的心理素质出发的。早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则从人的外表出发，认为文胜质则弱，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如果将此二说联系起来理解，则更有益于正确地对人做出判断。

此外，刘向、诸葛亮、唐太宗、司马光等亦对人格的类型有所论述。

### 三、人格鉴定思想

在古人看来，知人是最难的一件事。如庄子就说：“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sup>[8]</sup>诸葛亮也说：“夫知人之性最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尽忠者。”<sup>[9]</sup>所以，古代思想家在如何鉴定人格的问题上多有探讨。如孔子、庄子、鬼谷子、荀子、韩非子、吕不韦、王充、刘劭、诸葛亮、魏征、李翱等分别提出各自的人格鉴定方法，又称知人法。兹列举如下。

(1) 孔子的“听观法”。孔子不仅从多角度提出知人的依据，而且还提出自己的知人方法。他认为，知人不能只是“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即“观其所由，察其所举，视其所安”。<sup>[4]</sup>只有将“听言”与“观行”结合起来，长期考察，才能知人。



(2) 庄子的“九征”法。庄子认为“人者貌厚情深”，所以知人甚难。但并非不可知，于是他提出知人“九征”法。他说：“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sup>[8]</sup>此说对后世影响甚大。

(3) 鬼谷子的“揣情术”。鬼谷子发明了一种知人心理的“揣情术”。对此，他解释道：“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也，不能隐其情，情欲必失其变。”<sup>[10]</sup>这里的“欲”是指欲望、爱好；“恶”指厌恶。就是说，通过观察人在极高兴或极惧怕时的好恶表现，可以了解人的内心真情。故名“揣情”。

(4) 荀子的试观知人法。荀子说：“故校之以礼，而观其能敬也；与之举错迁移，而观其能应变也；与之安燕，而观其能无流也；接之以声色，权利，忿怒，患险，而观其能无离守也。彼诚有之者与诚无之者若白黑然，可诘邪哉！”<sup>[2]</sup>

(5) 韩非子的知人术。韩非子提出御臣七术，其中“三术”是讲知人的方法。韩非子说：“主之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sup>[11]</sup>其中的“众端参观”就是要从各个方面考察臣子的言行；“挟知而



问”就是明知故问；“倒言反事”就是正话反说，正事反做。后两项是用来考察臣子是否忠诚、可信。

(6) 《吕氏春秋》的“八观六验”法。《吕氏春秋》写道：“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指邪念)，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指卓异才能)，哀之以验其仁，苦之以验其志。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sup>[12]</sup>此说是对庄子“九征”法的发展。

(7) 王充的“以言观心”法。王充，东汉杰出的“异端”思想家。他在《论衡》中提出“以言观心”法，他说：“何以观心？必以言。有善心，则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则有善行矣。言行无非，治家亲戚有伦，治国则尊卑有序。无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恶同伦，政治错乱，法度失平。故心善，无不善也；心不善，不能善。心善则能辨然否。然否之义定，心善之效明，虽贫贱困穷，功不成而效不立，犹为贤矣。故治不谋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责效，期所为者正。正是审明，则言不须繁，事不须多，故曰：‘言不务多，务审所谓。行不务远，务审所由’。”<sup>[3]</sup>

(8) 刘劭的“八观”“五视”知人法。何谓八观？刘劭在《人物志》中写道：“八观者，一曰观其夺救，以明间杂。二曰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三曰观其志质，以知其名。四曰观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寒。六曰观其情机，以辨怨惑。七曰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sup>[6]</sup>何谓“五视”？刘劭在《人



物志》又写道：“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然后乃能知贤否。”<sup>[6]</sup>

(9) 诸葛亮“知人七法”。诸葛亮一方面强调知人之难，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实，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约定之意)之以事而观其信”。<sup>[9]</sup>不难看出，诸葛亮的“知人七法”是对庄子、吕不韦、刘劭等人知人之法的发展。

(10) 魏征的“六观”法。魏征，唐太宗时代杰出的谏臣，博学多智。他在贞观十四年上太宗疏中提出知人“六观”法。他说：“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受，贱则观其所不为。”<sup>[13]</sup>

(11) 李翱的“相人之术”。李翱，唐代文学家和唯心主义思想家。著有《李文公集》。他认为，“相人之术有三：迫之以利而审其邪正；设之以事而察其厚薄(指是否公平)；问之以谋而观其智与不才，贤不肖分矣。”<sup>[14]</sup>

此外，《大戴礼记》载有“六征”法。

如果以现代心理学观点审视古代人格鉴定方法，则主要有谈话法、调查法、观察法、情境法。除此而外，还有一种方法是活动产品分析法，此法主要是通过分析诗文或书画作品来鉴定人格的方法。这是古代思想家在“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画如其人”、“言为心声，字为心画”等命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知人方法。关于文学



作品与作者人格的相关性，古代思想家早有清晰的认识。早在先秦时期就有“诗言志”之说。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则说得更为清楚：“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性情。”<sup>[15]</sup>关于书法风格与人格的相关性，古代思想家也有精辟之见。唐代的孙过庭在其《书谱》中就说：“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资。质直者则径廷不遒，刚良者又掘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染于俗吏。”<sup>[16]</sup>与孙氏相类似，明代的项穆在《书法雅言》中也说：“夫人之性情，刚柔殊禀；手之运用，乖合互形。谨守者，拘敛杂怀；纵逸者，度越典则；速劲者，惊急无蕴；迟重者，怯郁不飞；简峻者，挺掘鲜遒；严密者，紧实寡逸；温润者，妍媚少节；标险者，雕绘太苛；雄伟者，固愧容夷；婉畅者，又渐端厚；庄质者，盖嫌鲁朴；流丽者，复过浮华；驶动者，似欠精深；纤茂者，尚多散缓；爽健者，涉滋剽勇；稳熟者，缺彼新奇。此皆因夫性之所偏，而成其资之所近也。”<sup>[17]</sup>与此二人有所不同的是清代的刘熙载，他在《艺概》中说：“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sup>[17]</sup>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古人通过诗、文、书、画鉴定书写者的人格，是一种十分便捷而有效的方法。

综观古代思想家的人格心理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先秦、汉魏六朝和唐代。唐代以后，少有惊人之说，这也说明，中国古代社会走过鼎盛时期以后，其思想领域也在承袭旧说中走向衰微。比较来看，我国



古代的人格形成、分类、鉴定思想多有独到之处。有些问题，西文现代心理学家还在研究之中，而中国古代思想家却以整体思维的方法早已跨入了真理的大门。如鉴定人格的情境法、诗文书画分析法等。所以，总结并继承我国古代这一份优秀的思想遗产，很有必要。

## 参考文献

- [1]张纯一. 墨子集释. 世界书局, 1937. 15.
- [2]梁启雄. 荀子简释. 中华书, 1983. 3, 4, 31, 32, 96, 169, 336, 337.
- [3]王充. 论衡. 上海书店, 1986. 15, 268.
- [4]杨伯峻. 论语译注. 中华书局, 1980. 12.
- [5]四部丛刊. 淮南子. 商务印收馆, 卷十四.
- [6]刘劭. 人物志. 新兴书局.
- [7]黄帝内经.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3. 129.
- [8]郭庆藩. 庄子集释. 中华书局, 1982. 1054.
- [9]诸葛亮集.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5. 69.
- [10]四部备要. 鬼谷子. 中华书局, 18.
- [11]陈奇猷. 韩非子集释.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516.
- [12]陈奇猷. 吕氏春秋校释. 学林出版社, 1984. 160.
- [13]叶光大. 李万寿. 黄涤明等. 贞观政要全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180.
- [14]四部丛刊. 李文公集. 商务印书馆, 26.



- 
- [15]郭晋稀. 文心雕龙注释.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 332.
- [16]历代书法论文选(上).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 103.
- [17]历代书法论文选(下).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 531.